

综述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

高龙彬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2-0084-0009

2003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出版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主编的《犹太人在哈尔滨》大型画册，这与《犹太人在中国》、《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在天津》共同构筑了犹太人在中国不同地区生活的完整画卷，让大家对犹太人在中国的境遇有了初步了解。2004年犹太研究中心出版的《哈尔滨犹太人》研究文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研究哈尔滨犹太人问题的最高水平”^①。2007年，犹太研究中心出版了《哈尔滨与世界犹太人》论文集和西奥多（特迪）·考夫曼的《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这期间，犹太研究中心还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李述笑、曲伟、刘爽、张铁江等人的著作或论文在“犹太人在哈尔滨”研究中“各领风骚”。其中，李述笑老师起到奠基作用，他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述略》等文章具有开创性。2007年，刘爽老师的《哈尔滨犹太侨民史》，“内容丰富，涉及犹太人流散迁移史、犹太复国主义史、俄国侨民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东北近现代史、东北经济史、哈尔滨地方史等诸多领域，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使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②。2005年，张铁江老师的《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一书，“把哈尔滨犹太人从传统

的俄侨中分离出来，更加注重研究犹太人的民族性，把社会上有关哈尔滨犹太人的传说，用历史事实科学地加以印证和阐释”等等。

除黑龙江的学者，中国国内其他省市的一些专家、学者，如潘光、王健、房建昌等人也关注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光发表于《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的《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哈津沪俄犹太社团的形成与发展》和发表于《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的《来华犹太人的国籍和法律问题（1840～1945）》，上海社科院王健的《关于日占时期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几点思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建昌的《上海和哈尔滨犹太圣衣社述略》、《近代中国东北的犹太人》等论文，也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对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论述和阐释。

这些专著、论文集和论文的出版和刊发，都为研究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原哈尔滨犹太社区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之子、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西奥多（特迪）·考夫曼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中写道：“1898

^① 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② 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2页。

【作者简介】高龙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年,哈尔滨城市开始兴建。此前,这里仅是一个小村庄。第一批犹太人随着哈尔滨城市的建设而来,最后一批于1963年归国离去,犹太社区在哈尔滨生息繁衍了65年。哈尔滨犹太人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传统,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另外一些人是文盲,缺乏最基本的犹太宗教知识,但是这些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很快就与社区融为一体,适应了新环境。这是犹太社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与流散到德国、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同,他们用了近百年时间才团结、凝聚在一起,而哈尔滨犹太社区几乎是在一夜间就形成了。”^①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的这段话比较全面地记述和评价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程及其特点。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中,他也就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生活状况作过叙述。同时,国内外其他专家、学者对此也作过大量的专门研究。

一、最初来哈尔滨的犹太人的“身份”意义

在探讨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时,“最早”或“第一个”来哈尔滨的犹太人及其身份往往是研究者或读者首先关注的问题。

目前,关于最初来哈尔滨的犹太人“是谁”,学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同时,也鲜有学者强调他们的“身份”意义及来哈的国际“背景”。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中提到:“1898年,犹太人开始在哈尔滨定居,犹太社区及会堂于1903年正式建立。第一批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自西伯利亚。”他还说,“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路轨的铺设,犹太人来到满洲”。“首批到来的是级别不一的铁路工人,其后是投资商、承包商、供应商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医生、工程师、律师和建筑师等等)。”^②

李述笑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中写道:“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S.L.别尔采里成为第一个来哈尔滨的犹太人。”他在《格·鲍·德里金其人》一文中考证,“据《犹太生活》杂志1939年1月3~4期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成立35周年纪念文章中载,第一个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是雅克夫·伊列维奇·别尔采里。他来哈的时间是1899年”。他强调,此说“可靠,《犹太生活》杂志更为权威”^③。

张铁江在《第一个来哈尔滨的犹太人——格利高里·德里金的墓碑发现记》一文中谈道,“笔者在哈尔滨市东郊的犹太人墓地发现了第一个来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希伯来墓碑,揭开了谁是最早到达哈尔滨的犹太人这个百

年之谜”。“此次发现的希伯来墓碑证实: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是第一个(1894年)来到哈尔滨并在此长期居住的俄籍犹太人,即第一个来哈尔滨的‘阿什肯纳兹’(指来自东、中欧及俄罗斯的犹太人)犹太移民。”^④

薛连举指出,“1898年之后,哈尔滨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基地和各国商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乐园。犹太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他还强调,“进入哈尔滨的犹太人,最早是在中东铁路开筑时随俄国人而来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随后就是来自俄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西欧国家的犹太商人”^⑤。

李锡岐在《犹太教传入哈埠的情况》一文中介绍,“犹太教在1898年由帝俄传入哈尔滨市。当时由于修建中东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相继来哈尔滨市,其中信仰犹太教人员较多”^⑥。

丹·本一卡南在《卡斯普事件——1932~1945年发生在哈尔滨的文化与种族冲突》一书中强调,“犹太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哈尔滨,这些原因包括商业机遇和他们认为将是一个自由的环境”^⑦。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格罗斯曼在《构建东北:1900~1940年间满洲的犹太人企业》一文中讲到,“犹太人被吸引到了满洲,除了纯粹的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满洲的相对宽容和自由的氛围:不论是官方的、经济的、还有社会的。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在这里非常需要,也受到普遍欢迎”^⑧。

刘爽在《哈尔滨犹太侨民史》一书中介绍和总结各种观点后指出,“我们将俄籍犹太人最初到达哈尔滨的时间确定为1896年前后,并且,也不想肯定某个人是来哈尔滨的第一个犹太人”。他解释,“因为客观地说,对于根本无法确定的史实,这种稍微模糊的定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⑨。

笔者认同刘爽的观点,但是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些

①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人》,第78页。

④ 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⑤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第149页。

⑥ 马维权主编:《黑龙江宗教界忆往》(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⑦ [以色列]丹·本一卡南:《卡斯普事件——1932~1945年发生在哈尔滨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尹铁超、孙哈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⑧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⑨ 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第40页。

最初来哈尔滨的犹太人的“身份”问题和来哈的国际“背景”问题。这些最初来哈尔滨的犹太人更多的是“淘金”者，而不是“逃难”者，尽管他们原来生活在俄国“栅栏区”。1896年，《中俄密约》的签订给俄籍犹太人来哈尔滨提供了“契机”。1896年6月3日，中俄两国签订的《中俄密约》第四款规定，“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①。

因此，西奥多（特迪）·考夫曼说：“1896年，中国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这项条约对增强俄国在中俄边境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在俄国，总的来说，犹太人受到严厉的限制，而来到俄国所取得的在中国的铁路附属地后，这种境况大为改观。这与俄国当时政策紧密相关。当时，为增加在中国的影响力，俄国不遗余力，他们废除了宗教和民族歧视。因此，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不仅有俄国人，还有格鲁吉亚人，甚至早期受其压制的犹太人，他们拥有完全的公民权。从此，犹太人开始向此地移进。”^②考夫曼这些讲述说明最初来哈尔滨的犹太人不是来哈“避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犹太人与其他非犹太人俄籍侨民一样，认为哈尔滨是“他们的”，他们是哈尔滨的“主人”。这不能不说带有某种“殖民”或“侵略”色彩。

笔者认为，俄籍犹太人在俄国国内首先被看重的是“民族”身份，也就是说首先关注的是哪个族，而俄籍犹太人来到中国哈尔滨后首先被看重的是“侨民”身份，也就是说首先被关心的是哪国人，而后才是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具体来说，在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首先是个“侨民”，然后才是“犹太人”。当然，针对在哈尔滨犹太人的“民族”身份，犹太人自身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有自己的墓地、医院、教堂、宗教公会、学校等一整套完整的机构、设施。俄籍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俄侨是有明确“界限”的。

二、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数变化考察

目前，学术界对哈尔滨犹太人人数特别是最多时期的犹太人人数量颇感兴趣，讨论集中。代表性著作或文章主要有李述笑、傅明静的《哈尔滨犹太人人、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王志军、李薇的《论20世纪早期哈尔滨犹太人的数量问题》以及薛连举在《哈尔滨人口变迁》一书中“犹太侨民”一节中的人口介绍等。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数，笔者首先列举几个认为可靠的数字。据1924年俄文版《哈尔滨—傅家甸商工与铁路指南》一书记载，在哈尔滨的犹太人“5848人，其中男2885人，女2963人”。1926年5月5日的《滨江日报》介绍，“1367人，其中男807人，女560人。

仅区内人口调查”。1919年1月17日《远东报》记载，“7500人。其中20岁以上者4500人，20岁以下者3000人”^③。薛连举在《1916～1930年哈尔滨犹太侨民数量的变动》一表中，把年份（1919年）误写为“1918年”。据日文报纸《露亚时报》介绍，1920年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数为20000人。而《滨江尘嚣录》第二章第四节记载，“迨民国十四年度（作者注：1925年）十月调查，哈埠人口，犹太一千四百人”^④；1929年，在哈犹太人人数量为1324人^⑤。薛连举指出，犹太人“经常持有双重身份：既持有居住国国籍，又是犹太人”。“1920年以后的不少统计资料，在犹太人的项目下常常标明‘包括在无国籍人口中’或‘不明’。”因此，“20年代以后犹太人的实际数量，要比统计表上的数量多”^⑥。据笔者了解，日伪时期，犹太人在哈尔滨和东北的数量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日本的满洲调查团，也有犹太人在东北的详细调查。

2010年3月，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田地街91号的哈尔滨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原丹麦驻哈尔滨领事馆），笔者在哈尔滨馆陈列柜中见到一份1946年3月份的《哈尔滨市种族别外侨人口数目调查表》。这份调查表详细显示，犹太人“十四岁以下，男78人，女79人；自十四岁至六十岁，男539人，女626人；六十岁以上，男187人，女171人。总计1680人，其中男804人，女876人”。这是笔者见到的第一份1946年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档案，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

为展现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变化，笔者再引用李述笑老师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中代表性年份的犹太人人数量。1902年年底，哈尔滨已有犹太人300人，犹太人店铺10余家。1906年，哈尔滨犹太人3000人。1908年，哈尔滨犹太人达6000人。1913年，侨居哈尔滨的犹太人5032人，占哈尔滨侨民总数的11.5%。1919年1月17日，《远东报》载，侨居哈尔滨的犹太人7500人，其中20岁以上者4500人，20岁以下者3000人^⑦。1920年，大批犹太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迁居哈尔滨，哈尔滨犹太人口增至20000人。1922年，侨居哈尔滨的犹

① 步平等：《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89～191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4页。

③ 参见《哈尔滨史志》1985年增刊第5期，即《远东报摘编》第九辑，第67页；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1896～1949）》，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出版，第82页。

④ [民国]辽宁散人：《滨江尘嚣录》，载李兴盛等主编：《东游日记（外十六种）》（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2页。

⑤ 参见李述笑、傅明静：《哈尔滨犹太人人、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载曲伟、李述笑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第42～43页；李兴盛等主编：《东游日记（外十六种）》（上），第893页。

⑥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第146页。

⑦ 参见《哈尔滨史志》1985年增刊第5期，即《远东报摘编》第九辑，第67页。

太人 11000 人。1924 年, 哈尔滨有犹太人 5848 人, 男 2885 人, 女 2963 人, 其中在业人口 2580 人, 占总人口的 44.12%。1926 年, 哈尔滨有犹太人 1367 人, 男 807 人, 女 560 人(统计仅限道里、南岗、香坊)。1927 年, 哈尔滨有犹太人 1352 人(仅特别市区内统计)^①。1931 年, 在哈犹太人 2600 人。1937 年, 在哈犹太人 1100 人^②。截至 30 年代中期, 70% 的犹太人离开了哈尔滨^③。

通过对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变化趋势的分析, 笔者认为,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变化特别大, 尤其是 1920 年至 1922 年间, 竟然减少 9000 人, 并且据目前资料来看, 1922 年后逐年大量减少。笔者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起伏, 说明俄籍犹太人只把哈尔滨看做一个“驿站”, 在哈尔滨落脚后往天津、上海等城市流动。赵喜昱指出, “1920 年出现了大批犹太人迁移外地的现象, 至 7 月份共有 1 万余人离开哈尔滨, 去上海、天津, 更多的犹太人去了美、英、法等国”^④。具体来说, 首先是“美国犹太人共济会向在德国被迫害的犹太人提出援救办法, 凡愿赴美国者可得美金 400 元, 充当旅费, 这些离德赴美的都是先到伪满洲国驻柏林公使馆办理入满过境查证, 取道上海赴美国”^⑤。同时, “大规模移民浪潮往往发生在历史大变动时期”^⑥,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波动还与当时苏俄国内以及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关于这方面的深入分析还是“凤毛麟角”。

据《哈尔滨俄侨史》介绍, “1917 年苏俄十月革命后, 大批的俄国侨民迁居哈尔滨, 但是俄国侨民迁居哈尔滨的高峰期却是 1922 年以后的事情”。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 1918 年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是 60200 人, 1920 年为 131073 人, 1922 年为 155402 人。而到 1923 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 “定居哈尔滨的俄侨一度多达 20 万人, 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哈尔滨成为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⑦。

通过分析以上资料, 笔者发现, 在俄侨大量移入哈尔滨的时候, 正是俄籍犹太人从哈尔滨大量移出的时期, 两者的迁移是“不同步”的。迁移过程中, 俄籍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俄侨的关系, 还有待专家学者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最多人数的讨论, 笔者认为, 在资料等方面相对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讨论意义不大。因为目前普遍认可的 20000 人, 已经让哈尔滨成为公认的远东最大的犹太人社区, 尽管薛连举在《1916~1930 年哈尔滨犹太侨民数量的变动》一表中列出, 据《哈尔滨日本商业会议所时报》载, 1921~1922 年, 犹太人 55000 余人^⑧。王替夫回忆, “当时, 我在公使馆(伪满洲国驻柏林公使馆——作者注)事务上兼任领事职衔, 亲手经办上述事宜, 故对犹太人问题比较清楚。德国政

府对这些出国的犹太人在出境时, 除身上衣服外, 只限带衣、帽、鞋一套, 现金 10 元。由 1939 年春到 1940 年 5 月末, 由柏林伪满公使馆取得入境查证(应为签证——笔者注)的犹太人就达 12000 多人”^⑨。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罗曼诺娃在《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慈善活动》一文中指出, “1938 年 3 月, 约 20000 的第一批欧洲犹太人难民经过苏联来到‘满洲国’”^⑩。她的数据来自 1943 年第 1 期的《犹太生活》(第 17 页)。她接下来介绍: “在这里难民们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同情和支持。犹太公会经常帮助难民, 日本当局没有进行任何干涉。”笔者对上述数据表示质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随着犹太人逐渐地迁移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道里区以通江街的老会堂、经纬街的新会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 以通江街的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贫民食堂、哈尔滨犹太养老院作为慈善保障场所, 以红专街的犹太私人医院、西五道街的犹太医院作为医疗卫生场所, 东风街犹太第一小学、红霞街犹太第二小学、通江街犹太中学作为教育教学场所, 上游街哈尔滨科学宫犹太人侨民会(即犹太人协会, 后称犹太宗教公会)作为公共管理场所, 以及集中于中央大街两侧的犹太人开设的银行、商场作为金融商业场所, 犹太人在哈尔滨以中央大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社区。

三、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商业经济活动

犹太人的商业头脑是在几千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被“逼”出来的, 他们作为一个没有土地和国家的“无根性”民族, 在别的国家里只能选择从事商业活动, 从中历练出一套经商之道。

1945 年以前特别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哈尔滨道

① 据《1927、1934、1945 三年哈尔滨市欧美移民人数明细表》记载, 1927 年犹太人 1113 人。参见李德滨、石方: 《黑龙江移民概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52 页。

② 曲伟、李述笑主编: 《哈尔滨犹太人》, 第 253~261 页。

③ 李兴耕等: 《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34 页。

④ 凌国新主编: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67 页。

⑤ 王替夫口述, 金淑梅整理: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94 页。

⑥ 李兴耕等: 《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 《前言》第 1 页。

⑦ 石方、刘爽、高凌: 《哈尔滨俄侨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7 页、71 页。

⑧ 薛连举: 《哈尔滨人口变迁》, 第 146 页。

⑨ 王替夫口述, 金淑梅整理: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第 94 页。

⑩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 《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 第 381 页。

外区形成了以八区为核心的生产加工中心，道里形成了以中央大街为核心的金融商业中心，南岗则是形成了以东西大直街为核心的哈尔滨行政管理中心。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道里区以中央大街为中心的犹太人社区，但是在道里的其他区域以及南岗、道外都有他们的“影子”。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尽管道里、南岗、道外在行政管理上还处于不同的国家或政府，呈现“两国、三省、四方”的市政管理格局，但是在经济上是互通的。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段光达在《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一文中指出，1926年，哈尔滨的市政管理权依旧没有统一，整个城市一分为四，仍处于多重行政管辖的特殊格局之中。其各自管辖范围如下：“傅家店属于吉林省滨江县；道里区、南岗区属于哈尔滨特别市；马家沟、顾乡、香坊、偏脸子、正阳河等其余江南各区，统归东省特别市政管理局属哈尔滨市；松花江哈尔滨段北岸的松浦区，则由黑龙江省长官公署下属的松北市政局管辖（1920年初该局设立时称马家船口市政局）。”^①

“在哈尔滨主要街道上，80%的生意都是犹太人的。”^②斯基德尔斯基、葛瓦里斯基、卡巴尔金、索斯金、德里金、卡甘、齐克曼、卡斯普等犹太人，在哈尔滨创建了银行、商场、保险公司、啤酒厂、卷烟厂、高级宾馆等等，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商业智慧，在哈尔滨创造了无数的经济奇迹，“成为哈尔滨早期金融业、工商业的奠基人及哈尔滨最早走向世界的开拓者”。“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房地产业和工商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③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经济活动，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张铁江的《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也可参阅曲伟、李述笑主编的《犹太人在哈尔滨》大型画册，后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犹太人在哈尔滨打造的“经济奇迹”。

对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经济活动的研究，笔者认为，对卡斯普、齐克曼等个案研究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这些个案的深入的研究。如个案研究方面^④，斯基德尔斯基、葛瓦里斯基的住宅在南岗，而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带。他们为什么要把住宅建在南岗？斯基德尔斯基、葛瓦里斯基与中东铁路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理清。同时，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经济活动整体研究还有待深入。

关于利用犹太资源促进黑龙江和哈尔滨的经济发展，黑龙江省研究者也作了探讨。有《关于引进以色列高新技术，促进黑龙江省经济振兴的研究报告》、《哈尔滨与犹太人经贸合作研究》、《关于发挥我省对以色列（犹太人）历史人文优势，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调研报告》、《关于建立“哈尔滨——以色列生态农业

科技示范园”的调研报告》、《以色列及世界犹太企业在华投资状况研究》等^⑤。但目前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效果并不显著。

四、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宗教生活

会堂、宗教公会、墓地等是一个完善的犹太人社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会堂是“犹太人进行公共祈祷、慈善、文娱活动和研读经书的场所，是犹太人的宗教、教育和公共事务中心”^⑥。教堂是一个犹太人社区形成的“标志性”条件，也是犹太人的精神维系之所。由于在哈尔滨信奉犹太教的侨民众多，故在那里设有犹太教堂（祈祷所）4座。其最早的犹太教堂称“西那国加教堂”，于1903年建在道里炮队街（今通江街），次为1908年建在道里商务街（今上游街）的“加拉伊母宗教公会”，复次为1916年建在道里小戎街（今南岗光芒街）的“马家沟礼拜堂”，再次为1920年建于道里斜纹街（今经纬街）亦称为“西那国加教堂”。在哈尔滨犹太教堂临近关闭之时，苏侨吉谢寥夫曾为其中两所教堂的负责人^⑦。犹太教会堂“的出现、普及和发展，在维系犹太民族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感情、共同特征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犹太人散居期间的精神生活中心，还是犹太人之间的沟通纽带”^⑧。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指出，“在所有的社区中，哈尔滨犹太社区被视为唯一的宗教社区。其他的社区尽管宗教仪式活动依然进行，但社区成员都过着世俗的生活”^⑨。

犹太教公会在“《圣经》中指犹太教最高议院及司法机构”。犹太教公会成员“由三种人组成：在职或退休的大祭司、文士和社会贤达。其中祭司代表神职界，文士代表知识界，社会贤达代表平民”^⑩。犹太宗教公会是哈尔滨犹太教最高管理机构兼民事管理机构。“1903

^① 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载《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②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48页。

^③ 曲伟、李述笑主编：《犹太人在哈尔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④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48页。

^⑤ 艾书琴主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史（1960～20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299页。

^⑥ 黄陵渝：《犹太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⑦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第448～449页。

^⑧ 黄陵渝：《犹太教与文化》，第193页。

^⑨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8页。

^⑩ 黄陵渝：《犹太教与文化》，第74页。

年犹太公会在中东铁路建设中心哈尔滨进行了登记。它的正式名称是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时有会员将近500人。”^①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管理市内犹太会堂、图书馆、浴池、墓地和救济贫民的食堂等，一切工作由宗教公会理事会领导。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由10人组成，监事3人。在1951年社会团体登记时的理事会，是最后一届理事会。1927年印制的《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组织章程》规定了该会的主要职能：“补助哈尔滨社区犹太宗教之需要，管理教堂及其教师（神父）经费，管理牲畜宰杀之祈祷；管理和登记本埠犹太侨民之降生、死亡、结婚、离婚等事宜；呈请中国官厅之准许，遵照中国法令，建设侨民学校及其经费之管理或其他犹太侨民文化教育之组织；呈请中国官厅之准许，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以救助贫苦之侨民。”^②

犹太人墓地是哈尔滨犹太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皇山公墓犹太人墓地，是现存远东最大的犹太人墓地。张铁江、赵连泰在《哈尔滨犹太人墓地考察研究》^③一文中介绍了哈尔滨犹太人墓地的变迁等。文中指出，哈尔滨犹太人墓地，最初的地址在哈尔滨东正教堂墓地后侧。1903年开始埋葬犹太人亡者。后迁至哈尔滨市太平区太平桥的太安街墓地，占地约3.75万平方米。根据哈尔滨人民政府1958年5月6日的公告，同年8月6日，将犹太人老墓地迁往哈尔滨犹太教会新组建的荒山（现称皇山——作者注）犹太人新墓地。“根据哈尔滨犹太公会的死亡登记名册，并结合墓地名册综合统计，自1903年5月28日，在犹太人老墓地首次埋葬（按老样式）开始，至1958年3月5日最后一次埋葬为止，55年以来，共有3173座犹太人墓葬。其中男性1923人、女性1250人。”哈尔滨犹太人墓地埋葬着曾活跃于哈尔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界的犹太人。犹太教拉比、哈尔滨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亚伦·摩西·吉塞列夫，犹太教公会会长A.考夫曼及亲属、奥尔默特、德里金等等^④。

哈尔滨市皇山公墓管理处主任李芳斌在《哈尔滨市犹太人墓地的开放与管理》一文中介绍，“目前皇山公墓内部保存完好的605座坟墓的犹太人墓地，是东北亚最大的犹太墓地”，“有据可查583座”^⑤。

据西奥多（特迪）·考夫曼回忆，在哈犹太人还成立了犹太丧葬互助会。犹太丧葬互助会是在完全自愿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果逝去之人贫穷困顿，埋葬是免费的，他们的家属不必为埋葬地和墓碑支付任何金钱，此两笔费用都由社区捐助，而且，每位去世的犹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他们墓葬前都会有墓碑。但是，当富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则必须为其支付许多费用，费用的20%用于埋葬，剩余的80%用于犹太社区福利机构的开销。”^⑥

笔者认为，哈尔滨的犹太建筑遗存的开发和利用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和提升。

以“返乡复国”为核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宗教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复国主义运动，笔者不作详细论述。相关文章可参见西奥多（特迪）·考夫曼的《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活动》^⑦和李述笑的《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述略》^⑧等。

五、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保障活动

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贫民食堂、犹太养老院、犹太医院、犹太丧葬互助会等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保障组织，是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哈尔滨犹太人的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创办于1907年，会址设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街）。会长齐特林。该会专对俄籍犹太贫困妇女实施救济，其救济人数最多时达190余人。救济款由会员会费及捐款解决，每年收支3000元左右。犹太妇女慈善会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社区福利事业及对穷人进行职业培训，使这些人能够自力更生，减轻社区的负担”。为达到此目的，犹太妇女慈善会“出资为工匠购买工作工具，帮助他们建立手工作坊；为乳品场购置奶牛；帮助欲离开哈尔滨的家庭。犹太妇女慈善会还向贫穷的家庭提供木柴和煤炭，因为哈尔滨寒冷的冬天持续七个多月，从10月份到来年的4月”^⑨。

犹太贫民食堂（免费食堂）由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于1917年9月在道里区炮队街创办，会长为穆布尔格。每日免费或半费供给平民俄侨两餐。其经费来自会员会

① 梅力霍夫：《哈尔滨犹太社区》，载《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刊》，1997年，第44页。转引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罗曼诺娃：《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慈善活动》，载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379页。

② 转引自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及旅游发展研究所黄澄《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的犹太人》，载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430～431页。

③ 此文先编入曲伟、李述笑主编2004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哈尔滨犹太人》；后编入张铁江著2005年5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

④ 张铁江、赵连泰：《哈尔滨犹太人墓地考察研究》，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⑤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272页。

⑥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39页。

⑦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94～96页。

⑧ 《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论坛文件汇编》（2006年），第142～145页。

⑨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30页。

费、义演和社会募捐，每年收支1万元左右。由于其经费有保障，这个贫民食堂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在开办。犹太免费食堂“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来哈尔滨的大量犹太移民提供伙食，在整整一年里，免费食堂提供热午餐，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在犹太人节日期间，也向犹太犯人提供饮食，犹太犯人是指那些因偷窃和非法持有外币而入狱之人。在逾越节的一周里，免费食堂每天均严格遵循犹太教规‘科谢尔’（洁净食物）准备三餐。在赎罪节，它在斋戒前后提供餐食。70%来免费食堂的是犹太人，但俄国人和中国人也可以到此求助。免费食堂每天提供170份餐，但并非都在供应地食用，因为一些人倾向于将食物带回家”^①。

哈尔滨犹太养老院创建于1921年1月，地址在道里炮队街。负责人为拉宾诺维奇。养老院以收容供养犹太人及俄籍犹太病残老人为宗旨，1934年在院老人有34人。年经费6000元左右，由犹太宗教公会资助及社会募捐解决^②。在犹太养老院，“老年人可以接受来自社会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上的关照和呵护。在养老院，一位内科医生定期来到这里，对老年人和病弱者进行巡诊，而当时的一位助理医生阿尔卡迪·夫特兰（Arkadi Futran）则每日俱来”^③。

1932年7月，大雨滂沱，连降27天。松花江水日涨，松花江洪水泛滥成灾，水位达海拔133.16米，哈尔滨太阳岛、十字岛完全淹没，马家船口民房倒塌，人民纷纷逃难。8月7日，江水暴涨，道外九道街江堤决口百米，道外受淹^④。据日伪当局统计，整个洪水期间，哈尔滨市患虎列拉（急性传染病霍乱的旧称，亦简称虎疫——编者注）的共621人，死亡248人，路毙者149人；患其他传染病的168人，死亡62人^⑤。

面对大水，哈尔滨犹太社团组织救护队，对受灾难民开展紧急救助。据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介绍：“许多中国人的生命被吞噬了，但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为此丧生。犹太社区领袖们刻不容缓地将大家组织起来，向处于困境中的家庭提供面包和水。医生乘坐小船四处巡视病人，活跃于传染病房。因为一楼也已经被淹没，‘贝塔’青年把灾区的犹太人输送到犹太食堂的二楼。志愿者们主动向老弱病残伸出援助之手，从免费食堂带来食物。直到五周之后，洪水方才退去。”^⑥

六、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文化艺术活动

犹太人在哈尔滨出版报刊、办学校，宣传远东犹太人的生活状态和培养音乐、美术等人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活，在哈尔滨留下了一抹厚重的文化色彩。2010年6月24日的《新晚报》报道《联合国授予哈尔

滨“音乐之都”称号》。文中讲道：6月22日，中国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Music City^⑦——Harbin,China!”（音乐之都——中国哈尔滨）从此，百年音乐之都哈尔滨，有了国际组织认可的固定品牌——Music City；哈尔滨人民百年来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有了世界认可的符号——Music City^⑧。笔者认为，“音乐之都”称号的获得得益于哈尔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丰厚的音乐遗产，其中在哈尔滨的犹太人音乐人才功不可没。

据《1917年到1930年代初的俄侨新闻出版物》一节介绍，犹太人刊物如下：《哈尔滨犹太人协会理事会通报》、《犹太侨民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机关刊）、《犹太人言论》（远东犹太复国主义地方委员会机关刊）、《走向新岸》（哈尔滨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出版）、《我们的生活》（上海俄国犹太人创办）、《犹太复国》（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小组创办）、《我们的言论》、《西伯利亚—巴勒斯坦》等^⑨。据《一二十年代哈尔滨报纸出版状况表》记载，犹太人报纸如下：1918年出版《犹太语言》，1919年出版了《我们的语言——犹太语》，1920年出版《巴勒斯坦流亡者》和《哈尔滨犹太社通报》。1925年出版《犹太生活报》，专门探讨犹太人的利益，特别是远东犹太人的生活，这份报纸一直到1935年后仍在出版^⑩。据《黑龙江省报纸简表（1901～1985）》介绍，《犹太生活报》是周报，创刊于1925年1月4日，负责人是考夫曼。1935年后继续出版，但是停刊年月不详。这份简表还提到一份犹太语报纸《德尔·魏捷尔·米兹拉赫》，创刊于1921年12月2日，停刊于1922年10月6日，负责人是比尔曼^⑪。另一种说法提到，“1920年，在比乐街^⑫59号创办了《犹太生活报》，编辑为阿·依·

①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32页。

②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第493～494页。

③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36页。

④ 参见李述笑编：《哈尔滨历史编年（1896～1949）》，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出版，第213～214页。

⑤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210页。

⑥ [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81～82页。

⑦ 笔者认为“Music City”译为“音乐之城”更为妥切。

⑧ 《联合国授予哈尔滨“音乐之都”称号》，载《新晚报》2010年6月24日。

⑨ 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第378～379页。

⑩ 石方、高凌：《传统与变革——哈尔滨近代社会文明转型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⑪ 黑龙江日报社新闻研究室编：《黑龙江省报纸简表（1901～1985）》，载《黑龙江报》（内部刊物）1986年第5期。

⑫ 东北起大成街，西南止中山路。1915年，称为“比乐时街”。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编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地名录》，1985年版，第150页。

卡乌弗玛恩。这份报纸内容丰富,涉及社会、政治、文学,是远东地区犹太问题的权威。是发行不局限于哈尔滨的日报。报社后迁到埠头区的炮队街”^①。

在哈尔滨创办、出版各种报刊的俄籍犹太人,“最为著名的是列姆比奇^②,曾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地出版《柴拉报》^③、《柴拉晚报》和《柴拉画报》”^④。据我国著名新闻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介绍,《霞光报》1920年创刊于哈尔滨;《上海柴拉报》1925年创刊于上海;《俄文霞报》1928年创刊于天津。《霞光报》于1920年4月15日在哈尔滨创刊。社址在道里区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创办人连比奇。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记述:该报“意译《霞报》,每日发行两次,晨刊曰《朝霞》,夕刊曰《晚霞》。昔在哈尔滨最占势力,在上海亦设分馆”又言“其消息灵通,议论精辟”。日伪时期,《霞光报》成为除《哈尔滨时报》外的唯一俄文报,1942年以后仍在出刊发行,停刊日期不详^⑤。报纸由“考夫曼任经理,责任主编是萨托夫斯基”。自创办之日起,《霞光报》就对哈尔滨俄文报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掀开了哈尔滨报刊史上新的一页^⑥。《霞光报》创刊十周年时,张学良还亲笔题词。

关于连比奇,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来华之前,曾在俄国最大的商业报纸《俄国言论报》当过记者,已经小有名气。他逃亡到哈尔滨后,对当地的文化状况和政治局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后,勇敢地决定创办一份“城市”报纸,或说是“通俗”报纸。于是,1920年4月5日他与记者希普科夫在哈尔滨共同创办《霞光报》,地址在埠头(今道里区)中国大街5号,连比奇自任主编^⑦。

1909年,犹太侨民会小学开办。1918年,哈尔滨犹太中学开办。1919年,哈尔滨犹太人教会学校开办^⑧。据《1928年私立俄侨中、小学一览表》记载,1920年在马街(今东风街——笔者注)成立的犹太第一小学,当年有5名教员和111名学生;1925年在商市街(今红霞街——笔者注)成立的犹太第二小学当年有4名教员和40名学生^⑨。

1909年后,在哈尔滨的犹太人还陆续开办了下列学校:音乐学校(中央大街),校长为捷尔什戈里诺伊·弗;商业会计学校,校长为哈达伊·阿·伊。小提琴学校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校长为特里捷恩别尔格·弗·格;钢琴、声乐学校,在商务街(今上游街),校长为什捷尔恩·子利泽·季特玛尔。1912年,犹太人在炮队街创办了图书馆,藏书13000册^⑩。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学校教育,笔者认为音乐教育是异常出彩和留下宝贵财富的一项教育活动。伯尔斯丁,1922年生,男,犹太小提琴演奏家,1928年侨居哈尔滨,1935年就读于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1941年

离开哈尔滨赴美国;迪龙,女,犹太钢琴演奏家兼音乐教育家,毕业于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钢琴专业,1925年侨居哈尔滨,1936年离开哈尔滨赴欧洲;吉斯金特,男,犹太大提琴演奏家,就读于俄国皇家音乐学院,1922年侨居哈尔滨,1935年离开哈尔滨;基洛夫,男,犹太长笛演奏家,1915年出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曾在烟台、青岛、上海等地从事音乐活动,后供职于哈尔滨铁路俱乐部乐队,1961年离开哈尔滨赴智利定居^⑪。在黑龙江省著名音乐史研究专家刘欣欣、刘学清整理的《部分侨民音乐家名录》中,有14名著名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或演奏家为犹太人,他们在哈尔滨、中国,甚至世界音乐史上名声显赫,为哈尔滨乃至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苗笛在《中国当代音乐名家与哈尔滨犹太音乐家的历史功绩》一文中强调:“哈尔滨是西方音乐传入东方的重要窗口,俄侨音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首批西洋音乐艺术家。他们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些音乐家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批犹太音乐家为犹太人。”^⑫如“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哈尔滨音乐学校学习时聆听过犹太音乐教育家或指挥家艾·梅捷尔、特拉赫金贝尔格、格尔施戈琳娜的教诲。金铁霖、李双江、郭颂等哈尔滨走出去的歌唱家,都是由哈犹太或俄侨音乐家开创的音乐教育结出的硕果。

目前,哈尔滨在全国的音乐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展示,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哈尔滨的优秀音乐财富,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在哈犹太音乐家或俄侨音乐家对我国音乐的影响。

① 凌国新主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73页。

② 在赵永华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一书中,“列姆比奇”翻译为“连比奇”。笔者认为“连比奇”为好。

③ 也有人译为《霞光报》、《霞报》、《曙光报》。该报在报头处用汉语写着《霞光报》。

④ 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第134页。

⑤ 《黑龙江省志·报业志(第五十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8页。

⑥ 赵永华:《在华俄侨人连比奇的新闻活动与办报主张》,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5期。

⑦ 赵永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⑧ 石方、高凌:《传统与变革——哈尔滨近代社会文明转型研究》,第286页。

⑨ 石方:《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1912~193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⑩ 参见凌国新主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73页。

⑪ 刘欣欣、刘学清:《哈尔滨西洋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97页。

⑫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420~421页。

七、犹太人在中国的跨地域活动研究

目前,中国哈尔滨、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特别是哈尔滨、上海的有关当地犹太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普遍忽视了犹太人在中国各地跨地域活动的研究,如在经济、文化、音乐等方面。这种跨地域活动,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各地之间,而且还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活动”,也不仅仅是在犹太人之间,而且还在犹太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之间。同样,俄侨在中国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音乐方面,2010年7月24日,黑龙江省多年来致力于哈尔滨西洋音乐研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学清先生,在黑龙江省图书馆“龙江讲坛”第150期,作了题为《哈尔滨西洋音乐对中国的影响》的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其中就对犹太音乐家在中国各地的跨地域活动作了一些讲述,这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尝试”和“开端”。他讲道,犹太钢琴教育家恰普里克,毕业于敖德萨音乐专科学校,1924年侨居哈尔滨,自1924年至1933年在哈尔滨从事钢琴教学活动,1933年至1938年赴上海学习和教授钢琴,1938年回哈尔滨从事钢琴教学活动,1946年至1955年任教于哈尔滨苏联高等音乐学校,1955年回苏联;犹太小提琴教育家托诺夫,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小提琴班,1918年后侨居哈尔滨,1925年前往北京、天津等地从事小提琴教学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赴香港;犹太长笛演奏家基洛夫,1915年出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曾在烟台、青岛、上海等地从事音乐活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汤亚汀在《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850~1950,1998~2005》一书中也提到,“193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犹太学生隆斯特列姆与其兄弟一起建立了一支爵士乐队,演奏探戈、华尔兹、狐步舞曲、布鲁斯,一鸣惊人。1935年,随着中东铁路转卖日伪政权,苏联员工纷纷回国,隆斯特列姆爵士乐队去上海发展,在‘百乐门’舞厅占据一席之地。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他们又去青岛。1941年重返上海‘百乐门’,直至1947年回国”^①。

在经济方面,卡斯普、斯基德尔斯基、葛瓦里斯基、索斯金等犹太商人更是在哈尔滨留下了“传奇”的经济活动。我们比较熟悉的卡巴尔金把大豆生意做到欧洲。收购阿什河糖厂的齐克曼专门从事从爪哇进口蔗糖和蔗糖批发销售。作为一个次要活动,他也从印度进口黄麻

袋子(“粗麻布袋子”),它们主要被用于当时已经很兴旺的满洲大豆出口。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在日本横滨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哈尔滨办事处设在石头道街北市场内。生于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犹太人“路瑞兄弟”,从事鲑鱼捕捞和皮毛生意。1902年,“路瑞兄弟”“不论在经营范围,还是在地理范围上,生意急剧扩张。短短几年内,除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外,路瑞家族建立了自己在海参崴、横滨、东京、上海、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的办事处”。后来“生意逐渐成长为‘工业帝国’”^②。美籍犹太人普列西,与山东人士齐竹山、郝如九合股,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大型糕点店,叫“义顺和”。义顺和的生意做得很大,除哈尔滨总店外,还在长春、大连、沈阳开设了分店,生产糕点和糖果,行销东北,很有名气。奥尔伦兄弟公司专门经营狗皮生意,在天津和哈尔滨设有连锁公司。他们从东北购进长毛狗皮,从天津经大连运往美国纽约,在那里加工成各种精美的皮革制品。金山洋行创办人罗古文1918年从俄国来到哈尔滨。他原是立陶宛犹太人,曾经经营西药业,来到哈尔滨后,先做西药经纪人,有了一定积蓄,便于1927年南下上海……1930年,与人合伙在上海的外滩开设了金山洋行,在闸北买了几间房当栈房,主营西药^③……

从音乐和经济方面看,犹太人在中国或国际的跨地域活动还是很频繁的,他们为什么流动、怎么流动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基本是“空白”。尽管受一些资料或档案的限制,但是在利用国内现有中文资料或档案,特别是俄、英、日、德等外文的资料或档案的基础上,跨地域活动研究还是可以深入进行的,比如流动的路线问题,并且这对国际关系史、民族交流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850~1950,1998~2005)》,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书中第32页,汤亚汀教授把“哈尔滨总会堂”和“哈尔滨新会堂”的照片标注颠倒。这可能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出版的《中国名城百年·哈尔滨旧影》(第71页)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画说哈尔滨》、《老明信片中的黑龙江》、《哈尔滨保护建筑》、《凝固的乐章——哈尔滨市保护建筑纵览》、《犹太人在哈尔滨》等。

^② 曲伟、[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第314、317页。

^③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0、71页。